

張
耒
集

上
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耒集 上冊

〔宋〕張耒撰
李逸安
孫通海點校
傅信

責任編輯：王秀梅

張 耒 集

(全 二 冊)

[宋]張 耒 撰

李 逸 安

孫 通 海 點校

傅 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茶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37 3/8印張·767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200冊 定價20.00元

ISBN 7—101—00455—5/I·69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張耒集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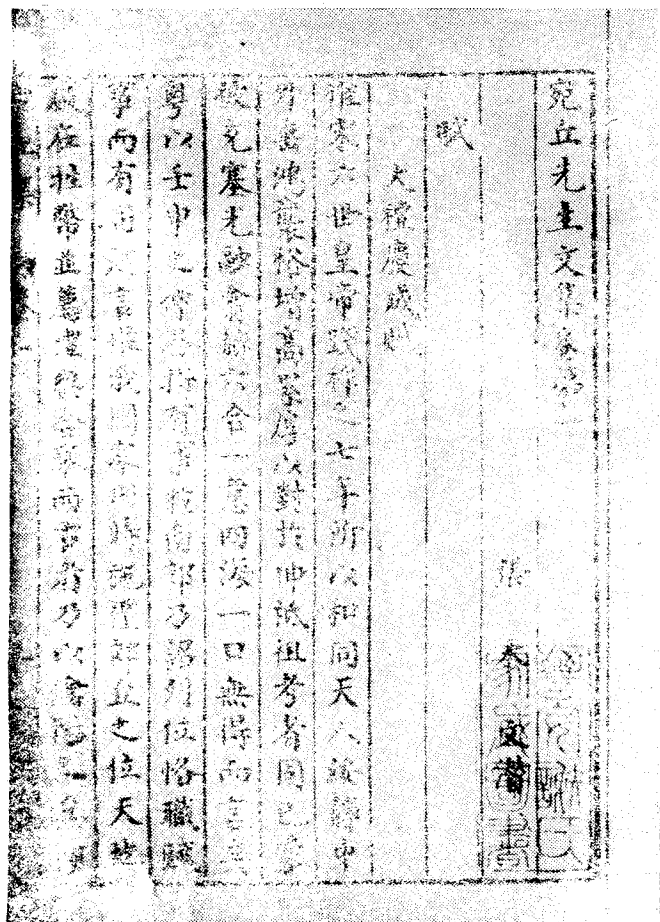
〔宋〕張耒撰
李逸安
孫通海點校
傅信

B 741544





張子畫像
選自清道光《古聖賢像傳略》



明小草齋鈔本《宛丘先生文集》

原本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前言

張耒（一〇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潛，號柯山，祖籍亳州譙縣（今安徽亳縣），生長于楚州淮陰（今屬江蘇），是北宋晚期的一位重要詩人。因曾擔任過起居舍人，所以人稱張右史。晚年居陳（今河南淮陽），陳地古名宛丘，因此又稱宛丘先生。

張耒青年時代游學陳州，以文章受知於學官蘇轍，因而得從蘇軾門下。軾稱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蘇軾《答張文潛書》）。在蘇軾的獎挹提携下，張耒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一時並有文名，世稱「蘇門四學士」。

張耒自敘出身說「家本淮南，仕者數世」（《上蔡侍郎書》），但有關其家世的資料極少，從他詩文中一些片斷敘述裏，可以推斷他的父、祖只任過一般官職，地位並不很高。

張耒幼即穎異，《宋史》本傳說他「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神宗熙寧六年（一〇七三）他二十歲，考中進士。次年，授臨淮主簿。元豐間，先後任壽安尉、咸平縣丞。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由大臣范純仁薦試館職，歷任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前後凡八年。元祐、紹聖之交，改任起居舍人。這一時期，他與晁補之、黃庭堅、秦觀一同供職三館，彼此詩文唱和，過從甚密。儘管也有黨爭的陰影籠罩，但居官「清班」，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

張耒初登仕途，正值王安石實施變法。蘇軾是反對變法的，四學士的態度自然也不例外。元豐末，司馬光主持朝政，不僅「盡廢熙豐新法」，對變法派也予以打擊。哲宗紹聖親政後，變法派章惇等重又執政，蘇軾遂連遭貶黜，遠謫海南儋州。張耒參加修撰的《神宗實錄》，也因采錄了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被新黨指斥為「謗史」，於是他便以染病為由，請求外放為地方官，遂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數月後，又因坐元祐黨籍，徙宣州。紹聖四年（一〇九七），再貶監黃州酒稅，接着又貶復州監酒，開始了他漂泊羈旅的生活。從元符末至徽宗崇寧初，張耒一度被起用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復出知潁州、汝州。短短兩年的時間，他「挈其妻孥，就食四方」，每任席不暇暖，飽嚙了「陸走水涉，辛勤險艱」之苦。之後因「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宋史·張耒傳》），又遭彈劾，貶為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他第三次謫居到黃州，住在柯山腳下。崇寧五年（一一〇六），張耒五十三歲，由於詔除黨禁，他才得以離開黃州。此後便長期投閑，寓居陳州，在貧病中度其晚年。政和四年（一一一四），乃抑鬱而終，年六十一歲。

張耒文學上的成就主要在詩歌創作方面，他的詩作不單數量較豐（存世二千一百多首），而且具有大量反映人民生活，關心民生疾苦的內容。如本集中《喜晴》、《早稻》、《大雪歌》、《春旱初雨》等許多將自然界雨雪寒暑與農事上旱澇耕收緊密相連的篇什，都表達了他「謫居困炊玉，無田願年豐」（《七月十日雨炎暑頓解有感》）那種農喜亦喜、農憂亦憂的真摯感情。但是，「年豐民樂」往往只是希冀而已。「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糶官粟有感》），面對着當時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張耒詩中更多的是對「饑腸不飽衣苦單」（《一畝》）的農戶、「以力受金飽兒女」（《勞歌》）的苦力、「不憂衣單憂餅冷」（《北鄰賣餅

兒」的賣餅兒等不同階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對「騰價邀吾民」的豪富（《糶官粟有感》）、「翁怒鞭人血流地」（《有感三首》之二）的酷吏們的極大憤慨。其中像「田家苦作候時節，汲汲未免寒與飢。去來暴取獨何者？請視《七月》幽人詩」（《田家三首》之三）這樣寓意深刻的詩句，歷來引人注目，頗多贊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和晁應之憫農》詩：「南山壯兒市兵弩，百金裝劍黃金縷。夜爲盜賊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數？爲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死戮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簡直可以說是「一篇專爲『盜賊』而寫的辯護詞」。像這樣直接揭示「官逼民反」現實的詩文，在本集中並非僅見。張耒出身於普通官吏家庭，仕履又多在地方卑職，這使他較易接觸社會現實。在北宋後期詩壇深受黃庭堅「江西詩派」的影響，輕視作品思想內容，提倡所謂「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風盛行之時，張耒能以同情的筆觸來抒寫勞動人民的苦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張耒詩在藝術上最大的特點是平易舒坦，「自然而有唐風」。晁補之謂「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開百花」（《雞肋集·題文潛詩冊後》），楊萬里謂「晚愛肥仙詩自然，何曾繡繪更雕鐫」（《誠齋集·讀張文潛詩》），都指出了這一點。譬如「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和周廉彥》）、「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初見嵩山》）、「夢覺隔窗殘月盡，五更春鳥滿山啼」（《福昌官舍後絕句十首》之二）一類詩句，清麗雋永，簡淡秀朗，若是雜在唐人集中，怕也不易分辨。再如「更將夢逐殘紅去，遍入長安百萬家」（《依韻和晁十七落花二首之一》），表現惜春情懷，構思新穎；「故歲如曉客，行意不可留。新春如美人，含笑未舉頭」（《晨起有感》），比喻將去未去，欲來未來的故歲新春，形象生動。又

如「莫謂無情卽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偶題二首》之一），寫戀人的脈脈含情，格調纏綿而悵惘；「逢時則駕子何患，有才未用誰之醜」（《寄楊應之》），在狂放中蘊蓄着悲愴的旋律。這些都會使讀者在吟詠之際，得到藝術上的滿足和享受。

以上可見張耒似有意效法白居易、張籍等人，追求質樸的詩風。但他過分強調「滿心而發、肆口而成」，從而忽視了對作品主題、形象、語言進行必要的提煉，甚至常常率爾操觚，草草終篇，以至於他的詩作玉石雜陳，良莠參半，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除詩歌之外，張耒還寫了不少散文，本集收錄近三百篇。我們知道張耒少負大志，終生都期待着能有匡時濟世、一展襟抱的機會。他的政論和史論，主要是闡述蘇軾提出的「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的政治思想綱領，縱言漢、唐以來歷史事件與人物，歷數成敗，品評得失，表現出一個有志「羽翼朝廷，潤色名教」的封建士大夫所具有的眼光和才幹。

張耒的文章還反映了他的文學觀點。他認為文章要經世致用，所謂「俗儒昧事實，文字工綵繡。可觀不可用，章甫冠土偶」（《讀戚公恕進卷》），華而不實、於世無補的文字，不過是衣着錦繡的泥胎而已。從這一點出發，他提出文章應是「寓理」的工具，「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答李推官書》）。他還認為「詞生於理，理根於心」（《答汪信民書》），文章著述是人們內心感受到的事理的反映。所以「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這就是他一再強調的直抒胸臆、天成自然

的創作主張。在江西詩派雕琢刻鏤之風泛濫時期，張耒的主張自有其可取之處。不過他不能將文學作品與其它經史著作相區別，忽視了藝術創作需要「精思」（《白石詩說》）的特點，割裂了作品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因而也影響了他的創作達到更高的成就。

在張耒散文裏，文學意味比較濃烈的，是他寫的題跋、書簡、傳記、雜記一類的文字。這些作品，或詠山水，或誌人物，或憶友情，或述軼事，信筆揮灑，語暢情酣。如《任青傳》、《吳大夫墓誌銘》等篇，掬貌取神，人物丰采畢現；又如《記異》、《書道士齊希莊事》，情節詭怪奇異，《竹夫人傳》用擬人手法，殊有韵味，都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張耒的詞作不多，就今天僅存的六首來看，一反他平淡質樸的風格，顯得富艷工致。賦作兩卷，內中除進呈御覽的篇章如《大禮慶成賦》等，寫得堆砌板滯、艱澀乏味外，其它抒寫性靈的小賦，也還是清新婉麗，值得一讀的。

張耒的詩文集在他生前便已行世，後因黨禍所累，於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與蘇門諸人的著作一起被詔令焚燬。不過他的許多詩文，仍爲人私下傳鈔與收藏。南宋初年，蘇門諸子的名譽得到恢復，張耒的詩文也被匯編爲幾種新的集子，得以陸續鈔刻流傳。根據宋人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推知當時幾種張耒集子的情況：

一、紹興初，汪藻（一〇七九——一一五四）編定《柯山張文潛集》（周紫芝著錄作《張龍閣集》）三十卷。共收詩一千一百六十四首，文一百八十四篇。汪藻《浮溪集·柯山張文潛集書後》說：「患世傳文

潛詩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爲此書。」汪文還提到他所搜集的張耒諸集中，「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這使我們得知了張耒早期傳本的名稱，是目前所見有關張耒著作的最早著錄。

二、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張表臣（一〇九二？——一一四六？）編定《張右史集》七十卷，共收古賦三十二篇，詩二千二百五十首，文二百六十四篇，加之《同文唱和》詩，通計二千七百餘篇。在《張右史文集序》中，張說他曾訪求張耒諸集，除得汪藻所編三十卷外，又得浙西憲司王鈇所錄四十卷，續集十一卷，又得察院何若數卷，又見秘監秦煊舊藏八冊不分卷本。而他則「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謬，補其缺漏」，編成《張右史集》。其網羅之豐，規模之大，在當時應首屈一指。

三、周紫芝（一〇八二——？）《太倉稊米集·書譙郡先生文集後》說他曾搜集到四種本子，一是「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洪家」，按此本疑與汪藻提到的《柯山》一源；二是「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按即汪藻）家」，按周紫芝與張表臣都曾搜得汪藻此本，可見汪藻手編三十卷本在當時流傳較廣，影響較大；三是「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按此本與張表臣編定本名稱卷數均同，當係一種；四是「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按此本爲井晦之之父「貽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讎，爲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

宋人書目著錄的，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載《柯山集》一百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宛丘集》七十卷，《年譜》一卷，又蜀本七十五卷。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宋代流傳的張耒集，雖然名稱不同，卷次各異，所收詩文多寡不等，但就其影響而言，主要有十卷本、三十卷本、七十卷本、一百卷本四種。

百卷本《柯山集》在明代尚有記載。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〇二）《少室山房筆叢·柯山集雜考》著錄有「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並稱「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因約明日購書，不幸「夜來鄰火延燒」，此書遂燬於火事。

清人徐葵《張文潛文集跋》說，他曾以宋代建安余騰夫所刊永嘉先生標注十卷本《張文潛集》與明代郝梁所刊十三卷本《張文潛文集》校對，「篇目正同，惟分卷則異」，因知郝本「即南宋初十卷之本，後人亂其卷次耳」。

張耒集的宋刊（鈔）本今已散軼不傳，目前可見的明、清諸本，其卷數與宋本無一相同，想必南宋以降，幾經傳鈔輯刻，皆失宋本原貌。

現存張耒詩文集，可以分爲四個系統：（一）《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藏有兩種本子：一是明代小草齋鈔本，二函十冊，現只殘存一至三十七卷、五十一至七十六卷，闕三十八至五十卷。此書原本不在國內，北京圖書館所藏是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復製的縮微膠卷。二是清代康熙呂無隱鈔本，卷帙完整。（二）《張右史文集》，六十及六十五卷。北圖善本室藏有清代翁心存校跋的明鈔本，六十五卷，十六冊；卷一至卷三十補配清鈔的明鈔殘本，六十卷，十二冊。清雍正七年謝浦泰鈔校

本，六十卷，另有補遺七卷，十二冊；東郡楊氏海源閣藏鈔本，六十卷，二十冊，不具序跋的鈔本，六十卷，二十冊。通行本則有《四庫叢刊》本，據涵芬樓所藏舊鈔本影印，六十卷。（三）《柯山集》，五十卷。現有下列幾種本子：一、《四庫全書》本，五十卷。此書為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纂修時採入。《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時誤為《宛丘集》七十六卷。二、大約與《四庫》纂修同時，武英殿又據舊鈔本排印了聚珍本，五十卷。三、清同治以後，福建、廣東相繼據武英殿聚珍本校勘重印。福建本時稱閩本，廣東本即廣雅書局本，亦稱粵本，正集均為五十卷，並附錄陸心源所輯《柯山集補》十二卷為拾遺，另附錄無名氏輯《續拾遺》一卷。四、北圖善本室藏有經近人傅增湘校補並跋的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本。五、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田毓璠據段蔗丈所藏粵本校勘重印本。此本除附拾遺、續拾遺外，並附有近人邵叔武所編張耒年譜。六、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此本據武英殿聚珍本翻印，另附拾遺、續拾遺。（四）《張文潛文集》，十三卷。北圖善本室藏有六部，均為明嘉靖間郝梁刻本，行款及篇次無異。其中嘉靖三年刊本，上有方功惠題記；又嘉靖十三年重刊本，上有清胡連玉題記。

上述四個系統，除《張文潛文集》為張耒的文章選本不收詩賦之外，其它均系張耒的詩文集，大體是按文體編排，但卷次及詩文多寡、排列順序各有不同。其中《宛丘先生文集》卷數最多，所收詩文亦較完備，然因系鈔本、殘本，且文字錯誤較多，不宜作為整理底本。《張右史文集》亦屬鈔本，且所收詩文篇目少于《宛丘先生文集》與《柯山集》，故也不宜用作底本。因此這次整理，我們採用了流傳較廣，校刻較精，收文較全的民國刊本《柯山集》為底本。民國刊本雖晚出，但在校勘上參訂較廣，頗有獨到

之處。如卷一《燔薪賦》「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第一句殿本、廣雅書局本均誤為「漢壁之可效媛」。又如卷三《于湖曲》「夜築于湖洗鋒鏑」，四庫本、殿本、廣雅書局本俱誤作「夜築于湖鋒洗鏑」，民國本則同傳增湘據宋刊《國朝文鑑》校錄。再如卷七《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為別》「莫思芙蓉子，丹方亂君心」，下一句現存張耒諸本作「丹田亂君心」，卷十《觀池漲有作》「三酌徑就醉，此懷誰與論」，上一句各本作「三酌徑就酌」，均為文義不順，而民國本校改為是。

在校勘方面，我們選用了明小草齋鈔本《宛丘先生文集》（簡稱草齋本）；清呂無隱鈔本《宛丘先生文集》（簡稱呂本）；《張右史文集》中文字精審、訛誤脫衍較少的《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簡稱叢刊本）；明嘉靖郝梁刻本《張文潛文集》（簡稱郝本）為主要校本。考慮到現存《柯山集》各本雖同出一源，但由於宋本失傳，傳本訛誤很多，各本在鈔刻過程中，各依所見作了不同程度的校改，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而我們又選擇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簡稱殿本）、廣雅書局本（拾遺部分）進行了校勘。

此外，我們還參校了有關的總集和類書，主要有：《宋文選》，宋刻本；《蘇門六君子文粹·宛丘文粹》，宋陳亮輯，明崇禎新安胡氏刻本（簡稱《文粹》）；《宋文鑑》，宋呂祖謙編，《四部叢刊》本；《古文關鍵》，宋呂祖謙編，明嘉靖刻本；《坡門酬唱集》，宋邵浩編，清影宋鈔本（簡稱《酬唱集》）；《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齊賢、葉棻編，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古今歲時雜詠》，宋蒲積中編，明石城書屋鈔本（簡稱《歲時雜詠》）；《十先生輿論》，宋人輯，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簡稱《輿論》）；《全芳

備祖》，宋陳景沂輯，農業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日本宮內省圖書館所藏原刻（前半部）本；《瀛奎律髓》，元方回編，明成化三年紫陽書院刻本；《宋詩鈔補》，清管庭芬、蔣光煦輯。近人傅增湘曾三次校閱《柯山集》，所據除宋刊《國朝文鑑》及舊鈔本多種外，尚有清代徐葵據宋代建安余騰夫刊永嘉先生標注本校錄的《張文潛文集》。傅氏校語中可供參考的，我們也予以採用，直稱傳校。

本書校勘大抵遵循如下原則：凡底本不誤而他本有誤者，不出校記；他本異文有參考價值者，寫入校記；底本有誤而他本正確者，以他本文字來補正底本，並寫入校記；底本中顯見的誤字逕改，不出校記；顯見的避諱字一般逕改，不出校記，某些因清人避諱所改的（如「華夷」改成「中外」，「夷狄」改成「群雄」等等），則據他本校正，並寫入校記；常見的異體字逕改，不出校記。

關於篇目的編次，大體上仍循底本，只對部分篇章卷次重新進行了編排。考慮到《同文唱和》詩四卷並非張耒一人之作，故由原卷二十七至三十，移作今卷六十二至六十五，置於本集最後。原拾遺卷一至十一，按其文體分別、依次插在原正集同類文體各卷之後，同時按順序改變卷次（如原卷六至九為五言古詩，拾遺卷一至二文體正同，亦為五言古詩，故插排於後改作卷十、卷十一。原卷十、卷十一則順序改作卷十二、卷十三）。原拾遺卷十二有《進齋記》一篇，今併入卷五十（記）後；有書簡七篇，今移作卷五十六；有墓誌銘五篇，今移作卷六十一。原續拾遺有詩九首，亦按其不同種類，分別移入相應卷中。原底本正集、拾遺、續拾遺中兩見的篇目，其重出者，盡行刪除。如原卷六與拾遺卷四《萬松亭有感》、原卷十四與拾遺卷五《秋日》、原卷十五與拾遺卷四《蒙恩除奉常有感》、原卷十九與拾遺卷六

《至日有感》、原卷二十二與拾遺卷六《宋景平命賦隔窗花影》、原卷二十二與拾遺卷六《晚春初夏絕句》八首、原拾遺卷三與續拾遺《伏暑日惟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詩同、題同、今刪後者。原卷二十《偶題》與原卷二十三《有感》、原拾遺卷三《寒夜》與續拾遺《寒食》、詩同、題不同、今刪後者。詩題依前者作《偶題》、《寒夜》。原卷十九《木芙蓉菊花盛開》與拾遺卷三《園花盛開拒病不能觀作詩喻之》、詩同、題不同、而原卷二十三《木芙蓉菊花盛開》、即原卷十九詩的前四句、今刪後二者。原拾遺卷四《東園二首》、即原卷十五《冬日雜興六首》之前二首、故刪除。原拾遺卷九《亂原論》、是《亂原說》與《憫刑論上》混雜後誤輯綴成一篇的、故亦刪除。今卷三十五《治術論》、原與《論法下》混爲一篇、今據他本分出。底本原闕、據《宛丘先生文集》、《張右史文集》所補的詩文、按文體編入各卷。張耒詞作六首、諸本不納、今據《全宋詞》（唐圭璋編、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重印本）輯出成卷、編入本集。

這次整理的《張耒集》、是所傳張耒各種本子的合集。此外、我們又從《竹坡詩話》、《詩林廣記》、《全芳備祖》等書中輯出詩十六首（句）、贊文一首、編爲《佚文輯存》附後。有關張耒的傳記資料及版本序跋等、亦一併附後備考。底本原有的序跋、年譜等、也並入書末附錄中。張耒另有《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屬筆記體專著、這次整理未予收入。爲了查檢方便、書後附有篇目索引。

整理點校工作中的錯誤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李逸安 孫通海 傅信

一九八六年十月